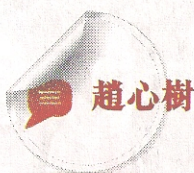


不懂民主，何以爭取民主？



10月12日，學聯岑敖暉副秘書長在商台《政好星期天》節目談到，關於撤離佔領地區的動議，只要有任何一個「朋友」（佔領運動領導者）反對，就被否決。此說佐證網上流傳「阿娟」和「阿華」等的描述：撤離的動議曾在學聯與學民思潮「十人領導小組」數次投票表決，都是多數人贊成，兩人反對，而遭否決（見「阿娟的佔中日記」及「民主真兄弟」網誌）。

少有人懷疑這些佔領者是爭取民主，但也有人認同這種「一票否決」是踐行民主。其實，一票否決比傳統專制更保守更僵化。

傳統專制集權於少數人或一個人，例如蘇聯曾集權與勃列日涅夫等人，中國曾集權於毛澤東一人。「集權於人」雖然僵化，但集權者還可能審時度勢，調整政策，改變方向，例如毛澤東主導與「帝國主義頭子」美國結成準同盟，共同對付昔日的「社會主義老大哥」蘇聯；又如勃列日涅夫晚年往塔什干發表傳遞善意的演說，啟動了中蘇和解的進程。

與「集權於人」相對，「一票否決」集權於一個既定決策，即維持現狀。一票否決看似尋求共識，號稱完美民主，實為固定現狀，屬於極端保守。如果實施一票否決，蘇聯就不會在與中國交惡互罵、流血衝突、瀕臨核戰之後，又重修於好；中國就不會在三年饑荒後出現三年調整，更不會有後來的粉碎四人幫、終止文

革和30餘年的改革開放。

一票否決因其極端僵化而成為人群組織體內的沙士或愛滋病毒，殺己害人，為禍社會。早在1989年，佔領天安門廣場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就曾不無自豪地宣布，在撤出廣場的問題上一票否決，多數服從少數；後來京城坦克上街，平民死傷，改革倒退，國際制裁，廣場上的一票否決是一個重要的技術原因和制度原因。今天的香港的佔領者，不應重複過去的錯誤。

要爭取民主，必須學習民主、研究民主、理解民主、踐行民主。以民主為宗旨的團體組織，在其集體決策中，應擯棄一票否決、個人專斷或少數專權等專制程式，也應避免多數票決、批准制等亞民主程序；要盡快學會和實行已知最為民主的「多訊記分」的投票制度。這意味着，首先明列所有可能選項，例如：

- 全面無條件立即撤出；
- 部分無條件立即撤出；
- 全面有條件延後撤出……等等，以及，
- 全面無限期繼續佔領。

在深入研究辯論後，由投票者給每個選項打分，實施其中平均標尺分最高者（詳見《選舉的困境》及筆者2013年以來《信報》文章）。

若反其道而行，不知民主而爭取民主，用反民主的手段爭取民主，爭得的只能是民主旗下的專制，甚至比明目張膽的專制更具欺騙性。

四分之一世紀前，京城廣場佔領者的反民主投票促成了民主運動的失敗，其災難性影響至今籠罩香港和全中國；四分之一世紀後，香港的大中小各類學校教育中，仍然欠缺民主投票的理論介紹和技術練習，以致香港的街道佔領者們，還在重複前一輩的錯誤。

無論佔領運動如何落幕，學術界與教育界都應痛定思痛，亡羊補牢，補上民主科普的空缺。用反民主爭取民主的悲劇，不幸「一而再」，豈可「再而三」？

香港浸會大學教授